

儒学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

● 龚友德 著



儒学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

● 黄友德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杨世光

封面设计: 孟嘉福

儒学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 吴友德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邮政编码: 650011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字数: 180 000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500

ISBN 7-222-01368-7/G·139 定价: 4.20 元

●
滇
文
化
丛
书



本书获云南省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会资助

编辑说明

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滇文化丛书”，顾名思义，就是侧重探讨广义的云南古传文化的专题系列论著。

云南之称“滇”，由来弥久。初有“滇”部落在此生息繁衍，战国时庄蹻开滇称主，至汉代即投置“滇王”，赐“滇王之印”。一代代古滇子民，皈依于这片38万平方公里的红土地，辛勤拓荒，不懈搏击，用血与汗、铁与火，铸就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此构成了悠久而灿烂的滇文化。

滇文化，鲜明地表现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云南高山丛立，江河纵横，盆地星罗，森林密布，因而山地文化、河谷文化、盆地文化兼而备之，红土文化与绿色文化交相辉映；且北靠青藏，东依中原，西连缅甸，南接老挝越南，换句话说，四向远离于海洋，呈现为一种陆相文化型。但它又有金沙江——长江、怒江——萨尔温江、澜沧江——湄公河、元江——红河、南盘江——珠江、大盈江——伊洛瓦底江等六大水系的辐射，得与海洋文化沟通，因而它还不全是封闭式的内陆腹地文化，仍可窥出特定的海陆交汇效应来。

滇文化，涵盖着多元的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云南有26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达一千万以上，是一个民族大博物馆，其中，独龙、怒、德昂、佤、布朗、基诺、拉祜、哈尼、阿昌等民族，系云南独有。每个民族，它们的耕牧渔猎、衣食住行，

它们的发祥、迁徙、分化与组合，它们的生殖、婚恋、丧葬、节庆、礼仪、法度、语言、文字、宗教、禁忌、审美等等，莫不结撰为个性鲜明、有历史厚度的文化链。正是这众多的文化链纵横交错，构成了云南的文化奥秘境界。

古滇大地上崛起过腊玛古猿和禄丰古猿，崛起过250万年前的东方人和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有着令人瞩目的人类起源文化。在这片被誉为动物王国、植物王国和有色金属王国的母土上，不仅留下了先民古老的火文化、石器文化、狩猎文化、游牧文化，而且积淀了先进的陶文化、青铜文化、稻作文化、茶文化、酒文化，以及诸如村落民居、寺院建筑、石雕木刻、编织刺绣、钱道马帮……等等难于道尽的物质文明，它凝结着滇边子民力图主宰自我命运、从必然索取自由的执着意志和创造智慧，铭印着滇文化一步步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跨越的轨迹。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行。这里有彝族毕摩文化、傣族贝叶文化、纳西东巴文化，有崖画、壁画，和以“海洋”称誉的神话、史诗、传说、故事、古谣、歌舞、戏曲、古乐，有两囊碑、《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滇南本草》……以及数不清的滇诗滇文、滇书滇画——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渗融，同台媲美，闪烁着夺目的思想灵光和艺术绚彩。

从学科来讲，滇文化不仅包括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伦理学、哲学、法学、史学、美学、文艺学、文字学、经济学等等社会科学的广阔内涵，也容纳有天文、地理、历法、农艺等等自然科学的生成讯号。

这是多么丰博璀璨的文化宝库！多么值得纵深勘察和发掘的智慧矿藏！每一块浑璞的矿石都有待还原出文明的七色光，击发出新的热力动能，为我们提供了何等广阔的研究求索的天

地！

我们欣喜地看到，过去，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四十余年间，我们在发掘滇文化宝藏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已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如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文学概况调查、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各民族简史的编写出版、民族古籍的翻译整理、民族音乐舞蹈和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等等，其规模、广度都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文化建设上自然是业绩煌煌；但它基本上还停留于展示实体蕴藏本身的阶段，即仅仅建造了一座宏大的资料库，对附着于这些丰富文化“实象”之中的“灵”——即内在规律、多向价值、思想能量等等深层性的质的剖示，则还注重得很不够，用资料库的元件构筑学术理论殿堂的工程还待大力开展以补白。现在，我们试想为这一工程的奠基做些推波助澜的微劳。

由此，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也便明确了，那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对这个滇文化宝库从总体到各个层次、侧面的脉络作一番透视和梳理，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寻出文化演进的规律和经验，阐发新见，力图对边疆开发的战略、方策有所启益，从而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同时，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为进一步活跃文化研究氛围、团结新老学者、扶持学术新秀、弘扬传统、繁荣著作、造就有生气的新时代的“诸子百家”，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尽一点我们应尽的责任。

立足于古滇边土，放眼于中华九州乃至世界的大文化背景，即便是一册薄书，也可以拓展出新的文化视野，展示出一个具有个性特征的文化殿堂；一个不大的专题，也能从历史经

线与时代纬线的交织中，透射出博大的信息，萌伸出幽远的哲理和深邃的思想。这也是我们的自信所在。

这套书，是由黄惠琨、杨仲康、杨世光、张福三等同志首议倡筹和主编的。奠基伊始，任重道远，而囿于我们的学识和能力，远不足以使之臻达完善，还期赖于群贤群策，鼎力玉成，唯望广大学者、读者热切支持，不吝赐教！

滇文化毕竟要发扬光大，毕竟能发扬光大！

编 者

1989年12月

序

韩 敬

龚友德同志多年从事云南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及文化传统的调查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取得了丰富的科研成果，《儒学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即作者多年调查研究的成果之一。

本书在详细占有云南少数民族实地调查资料和出土文物资料并广泛研究汉文文献的基础上，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儒学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这在我省以至于全国都是第一部，国内还没有同类著作出版。因此，本书属于开创之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立论稳妥，文风朴实，语言通俗易懂，叙述条理分明，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这对在各民族群众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也会起到促进作用，从而可望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

我在为友德同志的《白族哲学思想史》（1992年1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写的序言中，曾说过这样几句话：“记得多年前，我曾向我的导师任继愈先生请教在云南应如何做学问。他说，如能把云南少数民族的资料和我国的古代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有可能作出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成果。”在《白族哲学思想史》出版以后，有的同志又和我谈起这个话题，表示希望能对这段话有进一步的了解。因此愿借龚友德同志《儒学与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出版的机会，再就这个问题稍微具体地谈几句。由于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任继愈先生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说法，已难以尽述。现在只能根据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谈一点看法。也许谈的不能完全符合任继愈先生的原意，甚至可能会有某些不当之处，那当然只能由我个人负责，并希望同志们予以指正。

无论古今中外，研究历史，不管是思想史，还是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科学史等等，对于上古时代，都会遇到文献资料严重不足的问题。文献资料的这种严重不足，使研究者们不仅无法对上古时代的有关问题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甚至对仅存的一些零星资料也常常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这种情况，古代的学者们只能是一筹莫展，或者干脆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胡乱解释一通，结果远远背离了事实真相，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捏造出许多虚假的资料，给后来的研究者增添额外的困难。

直到近代考古学、民族学产生之后，这种情况才大有改观。那就是用考古学的发现和民族学的资料来弥补古代历史文献的不足，解释古代历史文献中的不明或可疑之处，甚至纠正古代历史文献中的错误记载或后人对古代历史文献的错误解释。由于利用考古学或民族学的资料，在古代历史的研究中作出前人所未发的卓越贡献的，中外都不乏其人。在我国，如王国维利用殷墟甲骨卜辞研究殷商历史作出的卓越成就，就是比较突出的例子。至于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利用出土甲骨文资料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研究起了奠基性作用的郭沫若及其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尤为大家所熟知，就更不必多说了。

至于以民族学资料推动和促进古代历史研究，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通过对北美印第安人原始氏族制度的系统调查对古代欧洲历史研究所作的杰出贡献。所以恩格斯认为，摩尔根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缘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页。）就是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的这些材料和马克思对《古代社会》的摘要与批注，加上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和深入的分析研究，恩格斯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古代历史，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以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我国的古代史研究和民族学研究所起的振聋发聩的作用，以及在它的基本思想指导下，古代历史研究和民族学研究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对于民族学资料在古代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我们的认识还是相当狭隘的。比起对考古学资料的利用来，在古代历史研究中我们对民族学资料的利用也是很不够的。当然，对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着重论述的民族制度、家庭制度、私有制和国家问题，我们是比较注意，多有论及。如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卷工作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者本人就认为是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续篇。其后又有不止一个人试图根据我国的民族学资料为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续篇，可见对此之重视。这种重视当然是应该的。因为这几个问题确实是历史和历史学中的重大问题，而且旧时代的学者也正是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清，有许多糊涂观念。为了建立真正科学的古代史，必须澄清旧时代的学者在这些问题上的糊涂观念，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民族学资料对古代历史研究的意义又决不止于此。民族学资料可以印证或说明古代历史的方面极多，从社会制度到人民生活，诸凡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科学、宗教，以至于风俗习惯等，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这是因为，我国不仅民族众多，而且这些民族在全国解放前夕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多种多样，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到封建领主社会，以至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封建地主社会，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而民族，作为一个现实的人类群体，它的生活本身就是全方位的，其所蕴含的内容，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和那些零星的残缺不全的古代文献资料相比，真可谓是天渊之别。只要我们善于发掘和利用，那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这里需要的，首先是一双建立在丰富的专业知识基础之上的善于发现其中有价值的内容的慧眼。

对这一点，古人已经有所察觉，所以才说：“礼失求之于野。”（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就是说，对于在官方场合已经失传的一些礼仪风习，可以到村野百姓中去寻觅其踪迹。当然，这和我们说的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古代历史并不是一回事。但从发展较快或较发达的人类群体到发展较慢或较不发达的人类群体中去寻觅自己生活早期的踪迹这个角度来看，其道理则是相同的。民族学资料对古代历史研究的可贵之处，也就在这里。所以每有发现，往往就震动学术界。我因未从事这方

面的研究，所以注意不多。但从云南来说，如马曜、缪鸾和先生以解放前西双版纳的封建领主制来印证我国西周时期的社会制度和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汪宁生同志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特别是彝族的“数卜法”来推断八卦和《周易》的起源和由来，都曾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注意，并对推进有关问题的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可惜的是这类研究成果毕竟太少了。我们的多数研究还没有把二者结合起来，而是对二者分别地作孤立的研究，因此其中蕴含的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并未被认识。这自然影响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以及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的获得。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我们有些同志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虽然认识到了，但由于对这种研究的艰巨性及获得成果的不确定性有所顾虑，因而不愿从事这种研究外，就老一辈学者讲，主要是各种外在条件的干扰，使他们无法专心地进行这种研究，或者根本不可能进行这种研究。以马曜、缪鸾和先生为例：他们从50年代起就已经开始对西双版纳和西周时期的社会形态进行比较研究，但在60—7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他们却无法继续进行这种研究，直到近年，他们关于这方面的专著才得以出版，但距缪鸾和先生去世已经十多年了，思之令人惋惜而且痛心。

就年轻一代学者讲，我认为影响他们从事这种研究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我国的古代文献太不熟悉。也是在为龚友德同志的《白族哲学思想史》写的序言中，我说过这样一段话：“当然，这件事做起来也难。据我观察，一些年轻同志在少数民族的实地调查方面还是花了很大力气的。虽然这方面仍有待于更加广泛和深入，因为社会调查和其他任何工作一样，也是没有

止境的。但我觉得他们的更大缺陷是对我国的古代文献太不熟悉。这就需要能够排除急功近利风气的干扰，认真坐下来读点书，然后把调查所得与古代文献作一番详细的对比研究。这样很可能会吃眼前亏，比如在职称、收入、以至于当前知名度的提高等方面吃些眼前亏。但却只有如此，才能在学术上做出一点可以垂之久远的成绩，为人类的精神财富增添一点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永久性的颗粒。”我现在仍然是这个看法。

从这个角度来看摆在我们面前的龚友德同志的这本《儒学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我觉得可以看出，龚友德同志是有条件从事这种研究的。因为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龚友德同志不仅掌握了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的大量资料，对我国的古代文献也涉猎甚广，还是比较熟悉的。虽然他这本书并不是从上面我们所说的这个角度来研究问题，而主要是想说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所受儒学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形成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意义和作用。但对云南少数民族资料的大量掌握和对我国古代文献的比较熟悉，使他具备了进行这种研究的条件。不知龚友德同志是否有这种兴趣？当然，从具备进行这种研究的条件到在这种研究中作出成果，其间还有很长一段艰苦的路程，需要付出极其巨大的努力。

另外，任何打算从事这种研究工作的同志，也要有劳而无功遭受失败的思想准备。因为真正的基础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的事业，其结果往往具有不确定性，成败是很难预料的。这种失败，往往并不是由于科学家水平太低、缺乏才能或者不够努力，而是由于取得科学突破的条件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甚至科学家的眼光越敏锐，越能抓住科学发展中具有超前意义的重大问题，却反而越不容易取得成果。原因就是解决问

题的条件不成熟，而且不可能很快成熟。这是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再有才能的人也无法超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光电效应和布朗运动的解释以及建立相对论理论上作出了巨大的成就，证明了他具有极高的天赋和科学才能。但在后来企图把电磁场和引力场统一起来的统一场论的研究上，他却艰苦探索近40年而迄无成效。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并不是像江郎才尽的传说传说中的那样，是因为他早年有天才而后期失去了天才，也不是因为他早年工作努力而后期放松了努力，而是因为当时科学的发展已经为正确地解释光电效应和布朗运动以及建立相对论理论提供了必要而且充分的条件；至于建立统一场论，则条件不具备。关于这个问题，不要说在爱因斯坦的时候，就是在爱因斯坦逝世后又经过近40年的今天，解决的条件也还不完全具备。所以虽经众多科学家多年的努力，也只做到了把弱作用力与电磁力统一了起来。对强作用力，就还做不到。对万有引力，就更做不到。因为迄今为止，科学家还在想办法探索万有引力的本质以及作为其载体的引力子是否存在。万有引力与其他三种力的统一问题可以说还没有真正进入科学家的现实研究范围，又遑论其解决。

所以，真正的基础科学研究是探索性的事业，并不一定就能做出成果来。当然，如果能做出成果来，就会有很高的价值，甚至是永恒性的价值。但确实又不一定能做出成果来。何况即使能做出成果来，那也需要多年的艰苦努力，不可能像“短平快”项目那样指日可待。就像恩格斯说的：“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

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7页。）所以，从事这种研究工作的同志，首先要有为科学事业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准备。否则，就不要做这种工作。即使开始做了，也难以坚持下去。这里正用得着马克思对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所说的话：“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1页。）

以上我们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但个人的品格、意志毕竟力量有限。如果不具备起码的外部条件，个人不管有多么伟大的天才和多么坚强的意志，也不可能在这艰巨的科学研究中取得成功。马克思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他的伟大天才和坚强意志，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如果没有恩格斯宁肯自己作出巨大牺牲而给他以大力支持，马克思的科学研究事业根本无法进行下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即使如此，马克思终其一生，也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未能全部完成其科学研究事业。可见外部条件之重要。我们的各级领导，应当懂得这一点，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基础科学研究事业给以大力支持。否则，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人们都追求眼前实利的条件下，我们的社会将只会容留一些能够立竿见影地取得实利的“短平快”型的应用技术性项目，而排斥不能立即取得经济效益的基础科学研究。长此以往，科学发展的后劲将会逐渐丧失。这对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以至于经济建设的长远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最近，湖北省京山县宣布，拿出100万元设立科研风险

基金，请专家们带课题到京山县进行研究。专家们在京山的生活费用和科研经费他们都包了。成果出来是专家们的。万一失败，不要专家负任何责任，允许科研中的失败。（见《光明日报》1993年1月17日第4版转发的《湖北日报》报道。）看了这条消息，我十分钦佩京山县领导同志的胆识与魄力。但只有一个京山县，力量毕竟太小了。但愿我们的各级领导都有这样的远见卓识，都能拿出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大力支持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事业。诚能如此，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事业必能摆脱目前面临的困难处境，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并为我国以至于全人类的文明发展作出较大的贡献。

1993年1月25日